

第四章——权力与自由意志

(1) 人们往往认为，在人类权力面前谈论“爱”只是空想。奇怪的是，他们把使用武力看作是必要的，而不是爱缺失的表现。他们一次又一次把自己的权力强加于他人，并称之为爱，却没有意识到，这种“爱”其实仍然是原始的。

(2) 然而，在其最高形态中，爱才是真正的至高法则；一切都通过爱而实现，没有爱，一切都会崩溃和毁灭。平等权利的法律源于爱，因为充满爱的人会努力平衡权利与义务，而被仇恨驱动的人只会破坏这种平衡。

(3) 在《慰藉者》一书第361问中（由灵体埃马努埃尔口述、奇科·泽维尔记录¹⁶⁰），作者提到一种“力量至上”的观念，这种观念妨碍了身处权力位置的人在精神上的成长。这类人往往只接受由力量支撑的事物，或被力量认可的原则。这种“力量”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控制，通过某种压力来实现——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

(4) 在《犹大福音》中，当门徒反抗耶稣时，耶稣挑战他们：如果有人是完美的，就站出来。他们却回答：“我们拥有力量¹⁶¹。”在《星球大战》系列中¹⁶²，“愿原力与你同在”这一句口号，用“力量”取代了“上帝”或“和平”的概念，并被反复使用。在马利亚的福音中，她记述了耶稣与反叛领袖吉斯卡拉的约翰的一次对话，耶稣拒绝了他的战争号召，并将“力量”视为与爱对立的东西。¹⁶³

(5) 那么，如果用武力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你会怎么看？这只会让人觉得你不讲理。如果你的道理真正成立，它本身就能说服人——它会带来和平，而不是冲突。人类至今尚未实现真正的和平，原因很简单：我们还没有进化出那种智慧。埃马努埃尔在同一段中总结道：“终有一天，真理与善的永恒权利将照耀大地，使这种暂时的‘力量’失去作用。”

(6) 在《疯狂与文明》中¹⁶⁴，米歇尔·福柯深入分析了“疯狂”以及“疯狂的定义”是如何被掌权者所塑造的。他展示了法国社会——更准确地说，是某些精英家族——如何利用国家权力把人

¹⁶⁰ Xavier, 1941年，第122页。

¹⁶¹ 《犹大福音》来源：Internet Archive: <https://ia800501.us.archive.org/0/items/white-alexandrias-library/The%20Gospel%20of%20Judas%20from%20Codex%20Tchacos.pdf>

¹⁶² 电影《星球大战》——导演：乔治·卢卡斯、J.J.艾布拉姆斯、欧文·克什纳、莱恩·约翰逊、理查德·马昆德。制作与发行：卢卡斯影业、二十世纪影业、坏机器人制作公司、华特迪士尼影业、拉姆·伯格曼制作公司，1977年。来源：维基百科: https://pt.wikipedia.org/wiki/Star_Wars。

¹⁶³ 《圣母马利亚的秘密福音》（作者：圣地亚哥·马丁），第183—184页（作者自译）：“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我来是为了拯救丧失的人，而不是增加毁灭。你试图建立的是这个世界的国度，而我所追求的国度并不属于这里。你相信力量，而我相信爱。也许你认为你会赢，甚至可能赢得几场战斗，但最终你会失败。至于我，我很快会死去，但不久之后，我将再次活着，直到永远。”

¹⁶⁴ 福柯，1978年。

关起来。不只是精神病患者，还有任何妨碍他们的人。福柯揭示了这些所谓“治疗”在历史上的荒谬之处：大多数更像惩罚，而不是治疗。其真正目的并不是治愈，而是重写现实——用社会控制取代医学真理。

(7) 在历史上，掌权者常常利用“精神失常”的判定来清除反对者。对支配主义者来说，把某人说成疯子，是让其噤声的一种手段。如今，人们已经被这种现实深深影响，以至于任何说出真相的人，往往都会被反问一句：“你是不是疯了？”在“反基督时代”，真理反而被等同于疯狂。而系统会打压那些说真话的人——因为真理威胁着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力量”。

(8) 创新与疯狂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自由思考的表现。一旦出现，就不会被忽视——因为它们使用的语言不属于支配体系的语言，而后者充满了“沉默规则”。这就是为什么社会话语常常听起来像一连串预设好的重复话术，还夹杂着各种陷阱。

(9) 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把“疯狂”当作一种永久状态来看待。但说实话，在某些情况下，不发疯反而不是不正常的。比如，一个人目睹一场残忍的谋杀后，怎么可能还能完全保持心理稳定？

(10) 支配主义者常常故意让对手心理失衡——试图把他们逼疯，或者让他们被永久贴上“精神不正常”的标签。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完全无视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11) 把一个人认定为精神失常，其实就是在社会层面抹去他的意志和人格——这几乎等同于一种“社会性死亡”。这个人失去了自由意志，不再被倾听，也没有权利为自己辩护。他被判定，却没有回应的机会。就这样，他不再对支配体系构成威胁。

(12) 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指出，精神病学并没有真正去发现疯狂的本质、让其获得解放，反而进一步加强对精神病人的控制。电影《飞越疯人院》¹⁶⁵就是一个强有力的隐喻：一个正常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并因为不服从而被实施脑叶切除手术——揭示出有多少正常人被当作疯子来控制。在20世纪70年代的巴西音乐中，Raul Seixas¹⁶⁶、Silvio Brito¹⁶⁷ 和 Rita Lee¹⁶⁸ 是最强烈质疑“疯狂”定义的声音之一。

《疯子之歌》

(Arnaldo Baptista 与 Rita Lee, 1972——改编译文)

他们说 I 疯了，因为我这样想
他们说 I 太疯狂，只因为我快乐
但真正疯狂的是这样说我的人

¹⁶⁵ 《飞越疯人院》——1975年美国电影，改编自肯·凯西1962年的同名小说。导演：米洛斯·福尔曼；制片人：迈克尔·道格拉斯、索尔·扎恩茨；制作公司：幻想影业；发行公司：联美公司。来源：维基百科: https://pt.wikipedia.org/wiki/One_Flew_Over_the_Cuckoo%27s_Nest

¹⁶⁶ 劳尔·桑托斯·塞沙斯——巴西歌手、词曲作者、制作人和多乐器演奏家，被认为是巴西摇滚的先驱之一。

¹⁶⁷ 西尔维奥·费雷拉·德·布里托——巴西摇滚及民谣摇滚歌手，以在军政府时期创作涉及社会与心理问题的歌曲而闻名。

¹⁶⁸ 丽塔·李·琼斯·德·卡瓦略——巴西女中音歌手、词曲作者、多乐器演奏家、演员、作家及社会活动家，具有美国和意大利血统。

而那些不快乐的人，不快乐的人

如果他们帅，那我就是阿兰·德龙

如果他们有名，那我就是拿破仑

但真正疯狂的是这样说我的人

而那些不快乐的人，不快乐的人

我发誓，其实更好的是

不要“正常”

如果我可以认为自己是上帝

如果他们有三轮车，我就能飞

如果他们虔诚祈祷，我已经在天上

但真正疯狂的是这样说我的人

而那些不快乐的人，不快乐的人

我发誓，其实更好的是

不要“正常”

如果我可以认为自己是上帝

是的，我真的很疯狂；我不会被治好

我已经不再是唯一找到平静的人

但真正疯狂的是这样说我的人

而那些不快乐的人——我很快乐

(13) 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疯狂”的社会中——一个由它自己来定义什么是疯狂，并用强制手段加以推行的社会，使人难以判断“正常”还是“不同”才更健康。在《外星人》（《精神病学家》）一书中，马查多·德·阿西斯通过¹⁶⁹ 一个故事探讨了疯狂的相对性：一位精神科医生拥有无限权力，还有一座全新的精神病院需要“填满”，于是他不断改变收治标准。最终，整个城镇的人都被关了进去。后来，他又将所有人释放，并宣布真正的疯子只有他自己，于是选择留在精神病院中，用余生研究自己的疯狂。通过这种方式，作者揭示了隐藏在所谓“正常”之中的荒谬。

(14) 在《权力的微观物理学》中¹⁷⁰，福柯深入分析了权力在社会中的运作方式。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他强调知识是支配最主要、最具战略性的工具。他称之为“制度化知识”——即由权力筛选、由强制生产并强加于社会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成为文化的共同代码，被当作不可质疑的真理——但实际上，它仍然与无数谎言交织在一起。

(15) 当有人试图反对这种制度化知识时，就会撞上一堵文化之墙。异议声音或替代性思想往往在完全形成之前就被扼杀——从而使反对者被孤立。制度化

¹⁶⁹ 若阿金·玛丽亚·马沙多·德·阿西斯 (1839–1908) ——1897年当选巴西文学学院院长。他是小说家、短篇作家和诗人，其创作经历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阶段。他的现实主义作品被视为杰作集，特点是对人物的心理分析、对社会的观察以及对浪漫主义价值的批判。

¹⁷⁰ (福柯，2007) ——《权力的微观物理学》：
<http://www.cidadaniareflexao.com.br/uems2018/Microfsica%20do%20Poder.pdf>.

过程会按照体系的利益来塑造知识，并在不同领域中不断强化，使其几乎无法被挑战。

(16) 一个例子是当今的舞蹈潮流，人们模仿与空气发生性行为。这种行为原始而动物化，但却被音乐推广、被社会鼓励，并在各种媒体中不断重复。许多公司甚至把这种带有色情意味的舞蹈当作“欢乐”的表现形式加以制度化，并向年轻人施压，让他们接受这种行为，以免因与众不同而感到尴尬。然而，从中立的角度来看，真正令人尴尬的，恰恰是这种舞蹈本身。

(17) 苏格拉底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仅仅因为反对制度化知识，就被判在公众面前饮毒而死。他的抵抗如此有力，以至于至今仍被铭记。然而，由强制维持的社会性愚昧依然存在——使同样的问题以不同形式延续至今。

因此，他们这样想：一个人怎么可能免费教学，还声称不需要像他们这样的老师？更进一步，他们反对苏格拉底的观点——认为人必须先验证某件事是否真实，才能相信它。……（柏拉图）

因为如果你认为，通过杀人可以阻止别人批评你生活不正当，那你就错了。这种消除批评者的方式既不有效，也不光彩。（柏拉图）

(18) 在古代，任何以个人权威发声的人，都会被用作“示范性惩罚”的对象——就像苏格拉底那样。在某些社会中，这种情况至今仍存在。但很多时候，这种惩罚不仅没有消灭思想，反而使其传播得更广。因此，这个体系不得不调整其策略。

(19) 如今在巴西，系统通过工作来控制人。例如在里约热内卢，过去街头小贩对任何人开放——这是那些找不到其他工作、面临饥饿风险者的一种生存方式。而现在，市政府要求他们获得官方许可，甚至必须穿制服¹⁷¹，把街头小贩当作正式商业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什么？限制这一职业，并加强国家控制。但由于法律无法全面执行，许多人干脆选择无视它。

(20) 这种控制对知识分子最为有效——而他们恰恰也是最容易受到制度化知识操控的人群。政府通过公务员考试雇佣他们，将他们锁定在官方话语体系中。如果他们敢表达不同观点，就会逐渐受到系统中受保护且忠诚的支持者的打压。如果压力使他们精神不稳，他们会被送去接受精神科评估——通常由机构内部的医生进行，而这些医生几乎总是将问题归因于“化学原因”，而非社会因素。一旦被贴上标签，他们就被迫服用精神类药物，使情绪变得迟钝——进而削弱判断力和行动能力。

(21) 个体经营者和自由职业者也面临着各自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向系统妥协，才能维持收入。社会中的排斥与分化机制，将人们推向顺从与对支配思想的共谋。对饥饿的恐惧、对警察暴力的恐惧，甚至对暗杀的恐惧，以及监狱中不人道的条件，都像持续存在的威胁一样笼罩着人们。而这些威胁，足以在新思想诞生之前就将其扼杀。

¹⁷¹ 巴西法律6.272/2017。

(22) 在当今的意识形态支配中，系统通过放任最糟糕的观点泛滥，来营造“所有意见都是自由的”这种假象。这正是破坏的方式。任何关于“缺乏自由”的主张都会被压制。与此同时，年轻人一开口就被否定。他们被灌输一种观念：他们没有权利利用自己的眼睛去理解世界。

(23) 制度化知识并不总是与学术知识一致。例如，在巴西的公共部门中，法律设定了明确的界限，只需少量要素即可将越权行为认定为犯罪。然而，学术知识却常常被当作空想，与支配主义观念相比毫无价值。员工之间流传的故事，往往把腐败、奴役、霸凌和性骚扰当作“常态”，而不是犯罪。

(24) 在公法中，每个人都应当遵守法律——不多也不少。否则，惩罚早已在那里等待。每一项职责从一开始就被明确写在制度中。例如，“礼貌原则”——这是防止人类行为动物化的主要屏障——既适用于公众，也适用于机构内部的同事。从理论上讲，没有人对他人发号施令：是法律在发号施令，而这本应足以规范人际关系。

(25) 然而，支配主义者推动原始的权力斗争，认为这样就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处于信任岗位的人，往往把等级理解为人优越性，从而缺乏基本的礼貌。在这种情况下，礼貌逐渐消失，道德骚扰也就变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常态。

(26) 我们的共处是由社会契约所规范的，这些契约不一定总是写在纸上，但它们受法律理性的引导。支配主义违背了这种理性——甚至违背了逻辑本身。在法律框架的背后，支配主义者常常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非法权力结构。支配主义本身仿佛具有独立的生命，不依赖于具体的执行者而存在。它延伸到社会最基本的层面——因为它是一种观念。而由于我们的习俗仍然相当原始，人们往往从小在家庭中就习惯了这种模式。

(27) 支配主义并不是固定在社会结构中的某个点上。它更像一张网络——各种装置和机制不断重复，把思想和行为连接在一起。这就是那张网。而在这张网中，还保留着一些“自由空间”，这些空间对支配的运作至关重要。那里正是权力斗争发生的场所——通过力量、通过思想，或两者兼而有之。紧张始终存在，确保没有任何人或事能够逃脱。

(28) 在这张网络中，总会不断留下“继任者”。个体被当作纯粹的工具来对待，使那些在强制之下被支配的人无法意识到体系之外的存在，也无法看清权力的边界。这种“盲目性”使他们无法把这种权力称为它真正的名字：篡夺。

(29) 知识在传播过程中本身也会被扭曲。在实际应用之前，规则就已经被歪曲。例如刑法，常常停留在纸面上，远离执法环境——在那里，暴力与强制占据主导，却被包装成所谓的“误会”。

(30) 支配始终在被施行，同时也始终在被争夺。人们争相攀升到更高的权力层级，在那些所谓的“自由空间”中争夺优势。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政府机构中

，当新的信任职位即将分配时。这些职位伴随着新的责任和更高的薪酬。当一位新法官即将上任时，人们的行为会迅速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原有关系网尚未稳固的情况下。

(31) 员工之间往往会为了职位展开激烈竞争，把更高的职位视为更大权力的象征，并经常越过正当的等级界限，走向权力篡夺。许多人甚至一想到自己处于较低位置，就会感到恐慌和绝望——因为他们害怕遭受自己曾经对他人施加的那种冷漠与轻视。

(32) 这些问题因对法律的普遍无知而更加严重。如果能够持续进行关于权利与义务平衡的指导——正如第869/69号法令第6条“d”¹⁷²项和第2条“f”¹⁷³项所规定的那样——就有助于缓解这一问题。由于“f”¹⁷⁴项已被人权原则所确认 并与宪法性保障相联系¹⁷⁵，它已经成为一项基本条款¹⁷⁶，因此不可被废除。我甚至认为，这一条款应被称为“法律的基石”——因为它直接涉及权利与义务的根本概念。

(33) 权力既可以向上腐化，也可以向下腐化。在工作关系中，员工可能利用工作时间谋取私利或忽视职责；同样，雇主也可能要求无偿加班或强加未曾约定的任务。这些行为都突破了合同中合法权力的界限。而当权力越界时，那就是篡夺——毫无疑问。

(34) 在国际层面上，当这种权力篡夺来自强国时，往往会被合理化。但侵犯他国主权始终是错误的——除非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例如在巴西，宪法确立了人权优先原则，但这只在一种情况下允许外国干预：即在极端情况下，为了大规模保护人类生命。

(35) 我们必须表明立场，否则就会承受自身不作为的后果。以当今的音乐为例，它常常教导男性通过性上的不尊重来对女性施加力量。同时，社会也默许

¹⁷² “d) 通过各种塑造公众舆论和传播文化的机构与组织——包括报纸、杂志、出版社、剧院、电影院、广播电视台、体育与娱乐机构、专业协会以及印刷与广告公司——进行引导并号召合作，以实现道德与公民教育的目标；……”：https://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decreto-lei/1965-1988/del0869.htm

¹⁷³ “f) 理解巴西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并了解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

¹⁷⁴ 第32条第2款——“每个人的权利受到他人权利、公共安全以及民主社会共同利益正当要求的限制。”（来源：美洲人权委员会）：

<https://cidh.oas.org/Basicos/English/Basic3.American%20Convention.htm>

¹⁷⁵ 第5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区别，保障在巴西的本国人与外国居民享有生命、自由、平等、安全和财产不可侵犯的权利，其中：……第三十三项——人人有权从公共机构获取涉及个人、集体或一般利益的信息，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供，否则将承担责任，但涉及社会与国家安全需要保密的除外。”：

https://www.planalto.gov.br/ccivil_03/constituicao/constituicao.htm.

¹⁷⁶ “不可修改条款” (*cláusulas pétreas*) ——规定于巴西联邦宪法第60条第4款：“凡意图废除以下内容的修正案，不得予以审议：……第四项——个人权利与保障。”

了对基督教日益增长的敌意。而现在呢？现在社会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因为激进伊斯兰主义——一种强化这些暴力倾向的意识形态——正在全球扩张。

(36) 早在20世纪70年代，嬉皮士运动的影响似乎正在消解这种对女性的暴力，以及对基督教解放精神的攻击。一度看起来，我们正走向自由。但随后，系统进行了反击，大规模重新引入这些有害观念。甚至连动画片也开始正常化暴力，描绘原始人殴打女性、像战利品一样拖着她们的头发。而就在离婚法通过的同一年，媒体还推广了一首歌曲：

《她哭着来了 / 没有钱》（改编译文）
(Beth Carvalho, Ernâni Alvarenga 与 Benedito Lacerda, 1977)

她哭着来了
她想要什么？
我知道，她不是想挨打
一个爱玩乐的女人，一旦哭起来，
就是想要钱
钱，没有
没有
我有的是感情
可以给，也可以分
打骂也不会缺
但钱，不，那不是给女人的
如果她愿意
我可以把天地星辰都给她
但钱，没有

(37) 暴力是力量最明显的表现形式——一种粗糙的纪律强制方式，其目的只是控制。福柯称这种现象为“规训权力”，即通过强制来控制个体。但强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而试图通过强制来施加纪律，本质上是相当原始的行为——无论是身体上的、语言上的，还是心理上的。

(38) 强制是一种有效的约束——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其目的是阻止一个人表达自由意志。它像一道行动的屏障，通过惩罚来迫使人违背自身意愿行事。强制这一概念本身已经揭示了它的本质：它是对自由意志的侵犯。因此，它只应当用于正当的目的——并以更高的原则为指导。

(39) 事实上，剥夺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只有在说服无效且必须防止伤害发生时才是正当的——无论是为了保护个人还是社会整体。强制应始终是例外，并且从一开始就应设定清晰的界限。它本身带有破坏性的逻辑，而且由于容易激起反感，往往并不奏效。其缺陷存在于其本质之中。例如，侮辱就是一种道德层面的强制。

(40) 强制的目的，是让个体屈从，并对其身体进行细致入微的控制。它可以规定姿态、行为、习惯甚至语言。例如，监护人可能会打女孩，让她坐着时必须双腿并拢，而社会也会对这样做的女性进行侮辱。社会通过制造并传播带有性意味的羞辱性语言，来实施强制和控制。

(41) 家庭权威通过规训权力实施强制，并将其转移到学校，而学校则成为再生产支配的工具。于是，人们在尚未成熟时，就已经被系统施加了间接的强制。然而，在教育纪律时，如果不依赖强制，效果反而更好。像温和训练这样的技术——例如蒙蒂·罗伯茨的“join-up”方法——就证明了这一点。

(42)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纪律对人的发展至关重要。它所带来的条件反射，是实现目标的重要助力。我曾听人说：我们总会成为奴隶——要么是纪律的奴隶，要么是缺乏纪律的奴隶。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在不成为奴隶的情况下保持纪律。

(43) 真正的纪律——那种构建内在心理殿堂的纪律——并不会使人沦为奴隶。它是一种由个体持续实践的技巧，帮助人摆脱错误，朝着目标前进。成为纪律的奴隶更像是一种执念，这并不总是有益的，尽管在某些特定目标（如通过考试）中可能有用。正如雷纳托·鲁索所提醒的那样，学会为自己所用地运用纪律，才会引向真正的自由。

(44) 规训性权力作用于人的最基础层面——因此必须谨慎使用。只要想一想：当老师决定是否允许学生离开教室去上厕所时，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同样，在青少年时期，监护人出于关心，可能需要让孩子待在家里、禁止他们去某些地方，或者查看他们的信息。但如果这些行为被当作惩罚来使用——再加上持续的监视甚至打压——就会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

(45) 然而，对控制的渴望常常让照料者越过这些界限——走向心理上的折磨，迫使年轻人陷入危机，逼迫他们说出内心想法。在这一点上，控制就与疯狂相交——不仅体现在被控制的人身上，也体现在控制他的人身上。

(46) 从某种角度看，纪律会让人像马戏团的大象一样——从小被训练不去挣脱脚上的锁链。因此，当它们长大、已经有能力挣脱时，却依然不会尝试。

(47) 但相反的过程也可能发生。当一个年轻人习惯于克服大的挑战时，他长大后就具备面对更大困难的能力。纪律既可以解放人，也可以奴役人。我们最大的敌人，可能就在自身之中。在约束他人之前，人们应该先问自己：我是真正有纪律，还是只是执念过强？

(48) 纪律既有低层次的含义，也有高层次的含义。在高层次上，纪律使人能够在判断力和知识的引导下，更好地发挥自身的能力。而缺乏纪律，则会导致人的潜力被浪费。能够自律——或在不依靠强制的情况下引导他人——也许是我们能给予自己或他人最宝贵的礼物。有纪律的人更容易实现目标；没有纪律，这条路就会变得更加艰难。

(49) 规训性权力常常与系统本身难以区分。它在塑造我们适应系统的能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这种能力对生存来说至关重要。这一过程始于个体。一个具有自律能力的人，能够将自己的力量集中到特定目标上。问题在于过度和扭曲。

(50) 制度化知识一直是系统性控制机制的一部分。从这里开始，这种机制扩展到空间的组织——通过将人们围绕共同目标（如工作）聚集起来，对其进行规训。

(51) 空间的组织也包括通过隶属关系或协作关系来组织人——要么在他人的指挥下，要么指挥他人，或在平行的角色中运作。当个体被卷入这种控制体系时，系统会根据他们的角色来识别他们，逐渐形成特定的“人群类型”。

(52) 时间控制涉及对人在执行任务时行为的调节。这种控制与监督相结合，以确保任务按照既定知识完成。

(53) 随着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时间控制变得越来越强——目标是尽可能快速和高效地生产。“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反映了支配者的思维方式，它让被支配者接受自身被束缚的合理性，并形成一种被普遍遵循的共同规则。这种机制产生了一种“顺从—有用”的关系，从而减少反抗。

(54) 监督是最具战略性的控制手段。人可能会逐渐把它感受到为持续且无处不在的存在，并内化为一种“被观察的视角”，以防御某种外在的压迫性目光。这是危险的——因为当一个人内化了支配者的身份，就会按照这种身份来塑造自己。这可能导致身份危机，阻碍情感成熟，甚至妨碍对幸福的追求。

(55) 在电视剧《明日少年》早期版本中，“杰德凯亚的奴隶”这一集中出现的反派角色¹⁷⁷，完美地说明了这一过程——他就像一个无处不在的外部之眼。在这部剧中，主角们一直被反派监视，就仿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始终处在摄像头前一样。

(56) 这种影视化的表达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人们心中植入了被监视的感觉。当被支配者使用支配者的知识时，就会从对方的视角看世界，并在内心形成一种对所有反对该知识的事物的自我监控和压制——从而变成自己的压迫者。有时，这种视角被内化得如此深，以至于人们在内心对话中也会重复支配者的话语，用它来攻击自己。

(57) 这种干预不仅作用于个人，也作用于组织。在巴西，大众媒体承担着这种意识形态调节的角色，通过幽默贬低巴西人，从而贬低本土文化。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中也同样存在：本国的重要作家和作品被忽视，而来自美国和其他强权国家的一切却被高度推崇。结果，巴西人逐渐形成对自身文化的压抑性看法，并开始用外国人的视角来看待自己。

(58) 此外，我们的学校忽视本土知识，使我们转而接受外国文化，并被要求使用他们的知识。例如，在中小学阶段，我们并不会系统学习本国的生物多样性或健康饮食在医疗和药用方面的价值，尽管这些知识在祖先中早已存在。因此，我们的行为也被控制——那些想要出人头地的巴西人，不得不去适应外来的标准，从而压制本土文化。

¹⁷⁷ 《未来人类》——1973年4月30日至1979年2月19日在ITV电视网首播，在巴西由环球电视台播出。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Tomorrow_People.

(59) 控制还体现在对知识的持续记录之中。这正是支配网络得以维系的方式——制度化知识像一条线，从头到尾贯穿其中。在管理者行使权力的同时，也在生产知识。那个用来观察和控制的“目光”，同样负责提取、记录并向权力结构的高层传递信息。因此，没有任何制度化知识是中立的。它具有政治性，源于权力关系，通过操控“真相”来引导整个社会。

(60) 像医院、学校、监狱和精神病院这样的机构，不仅仅是治疗、教育、惩罚或照护的场所，它们同时也是知识的生产、积累和传播中心。医学、教育学、犯罪学和精神病学等学科，正是在这些机构中诞生的。

(61) 为了完善这张支配之网，所有知识都会服务于权力的运作。它使人在支配结构中能够操控这些知识。福柯指出，存在一些不同于国家但又与国家相连的权力运作形式，并认为社会变革不仅取决于国家的改变，还取决于其周围运作机制的改变。

(62) 在我看来，只有当支撑权力篡夺的观念——也就是支配主义——在社会中被瓦解，并且坚持以真相作为工具时，一切才会真正改变。治理必须是正当的，而不是为了少数人利益而剥夺多数人的权利。所有真正的改变都必须是道德上的改变。社会问题反映的是个体问题，而诚实的道德转变只能建立在真相之上。

(63) 然而，由于我们的发展仍不成熟，我们甚至在宗教中也使用谎言。例如佛教，是一种方向良好的宗教，强调和平与善。但其故事中的隐喻——比如赋予动物、身体部位或变化能力以“声音”——并不现实。这是因为有人难以表达，也有人难以理解。但这也使得这些故事的真实体验难以触及，从而让其教义显得模糊。

(64) 不过，我想说明一点：佛陀的教导并不违背上帝。它引导人的思想走向更高层次——可以称为“精神智慧”——而不是引向其他神。宇宙的逻辑高于控制的逻辑。当我们按照这种更高的逻辑成长时，就像沿着一条“神经路径”发展，扩展我们思维的方式。佛教正是在寻找这条路径——提倡善念与善行——因此，它不应被否定为一种宗教。

(65) 可以说，《圣经》中也包含一些带有神话色彩、甚至不太可能发生的故事。因此，我并不相信其中的全部内容。但耶稣的比喻更侧重于人的经验，他的话可以直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比如，我们大多数人就像对上帝而言的“浪子”¹⁷⁸，这种关系是直接

¹⁷⁸ 《圣经》，马太福音13:3-9 —— “他用比喻对众人讲了许多事，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小鸟飞来就吃掉了。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因为泥土不深，很快就长起来。但太

的，因为耶稣教导说，上帝是父，我们是他的孩子。同样，在“播种者的比喻”中¹⁷⁹，耶稣用人们熟悉的耕作经验，来说明我们自身的状态。

(66) 按照主的教导，我们绝不能像“三不猴”那样，闭眼、闭口、闭耳。制度化的知识固然重要，但自由的知识同样重要——也就是依靠我们感知和验证真理的能力所得来的知识。

(67) 而系统却教我们相反的东西，用“三不猴”的形象，或者“打不过就加入”这样的陈词滥调，暗示我们要放弃自己的信念，去迎合更强的一方。同样，一个狡猾的支配者往往会假装投降，扮演受害者，以博取同情，让他人屈服，从中获利。

(68) 只要我们继续与这些“心理变态者”同流合污，默许那些不正当的权力结构——例如对女性的压迫、选举式独裁、非法监禁制度等——我们就会停滞不前。这些都是建立在谎言、权力掠夺和恐惧之上的低效社会结构。它们通过否定个体、从死亡中获利而得以维持。如果不加以阻止，这个问题只会不断恶化。

(69) 每一个被不公正关押的人背后，都有一个充满悲伤与愤怒的家庭，甚至可能渴望向看守复仇。同样，这个国家的大多数贫困人群，也在沉默中看着各种不公被当作常态。既然我们容忍这种残酷对待，那么我们又凭什么把贫穷的囚犯称为“罪犯”？我们纵容恶，从而建立了一个充满怨恨与暴力的社会——尽管我们本可以用自由意志去反抗或拒绝这一切。

(70) 以“纪律”为名的迫害始终存在，它是一种迫使人们屈服于支配主义的工具。尽管这种屈从看似轻松，但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极其高昂。以巴西为例，这种顺从往往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瓦解。

(71) 支配主义的意识形态把自由意志描绘成罪恶的根源，声称只有服从才不会犯罪。确实，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人就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罪”的概念也就失去了意义，我们都会变成物体。对此，奈尔·德·阿西斯·奥利维拉修女在《论自由意志》中总结圣奥古斯丁的话：“犯错的能力与自由意志不可分，但避免犯错的能力才是自由的标志。”

(72) 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无论是否愿意，也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要么遵循因果的自然法则，要么遵循“收获法则”，即种得少却收得多。我们可以在社会影响力

阳一出来，就把它晒干，又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大了，就把它挤住。有的落在好土里，结出果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的，就应当听。”

¹⁷⁹ 《圣经·马太福音》13:3-9：他用比喻对众人讲了许多事，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小鸟飞来就吃掉了。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因为泥土不深，很快就长起来。但太阳一出来，就把它晒干，又因为没有根就枯萎了。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大了，就把它挤住。有的落在好土里，结出果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的，就应当听。”

较大的人身上清楚看到这一点，比如教师、神职人员或艺术家，他们的行为往往会在社会中产生更大的回响。事实上，及时为错误承担后果反而更好，这样伤害才不会继续扩大。

(73) 支配宇宙的法则首先是精神性的：有了平和，就有和谐；有了爱，就有统一；有了善意，就有力量。缺少这些品质，就会走向毁灭、心理痛苦以及各种层面的脆弱。我们要么通过爱接近上帝，要么通过痛苦接近上帝，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能理解事物运作的机制。宇宙的法则是法则，而不是建议；如果我们不遵循，就会偏离宇宙的逻辑。

(74) 存在意味着建设与积极，而不是破坏与消极。一个充满负面思想的心灵无法产生好的结果，因为它否定了积极的可能性。很多不良结果都源于错误的心态。例如，人们常常不去正面对问题，而是通过有害行为来逃避，比如酗酒——这是最常见也最具破坏性的方式之一。正因为如此，甚至连酒精的销售，系统都在无形中推动着一种精神层面的破坏机制。

(75) 更高层次的、神性的观念就像一副眼镜——它们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清现实。有了正确的观念，我们才能更好地运用自由意志；没有它们，我们很容易走向毁灭。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善或恶，但如果远离善，就谈不上真正的自由。

(76) 只有“奇迹”能够打破自然的因果规律。即使在现代，也有成千上万的人见证过奇迹，比如法蒂玛奇迹，或奇科·沙维尔、若泽·阿里戈等灵媒所进行治疗。有些人认为这些不是奇迹，但在我看来，它们确实是——因为它们改变了自然的秩序。这类看似不可能的疗愈，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也不仅仅源于机械性的力量，而始终取决于上帝的许可。

(77) 在这一点上，我与无神论者的看法略有不同。对我来说，并不需要依靠奇迹来证明造物主的存在。人类可以复制生命，就像较低层次的生命在其能力范围内所能做到的那样——但却无法创造生命。我自身的存在，以及生命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奇迹。

(78) 同时，我们也不能只是等待奇迹。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在尊重自由意志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同时维护人的尊严。共同行动本身就是人类进化的一种体现，我们必须这样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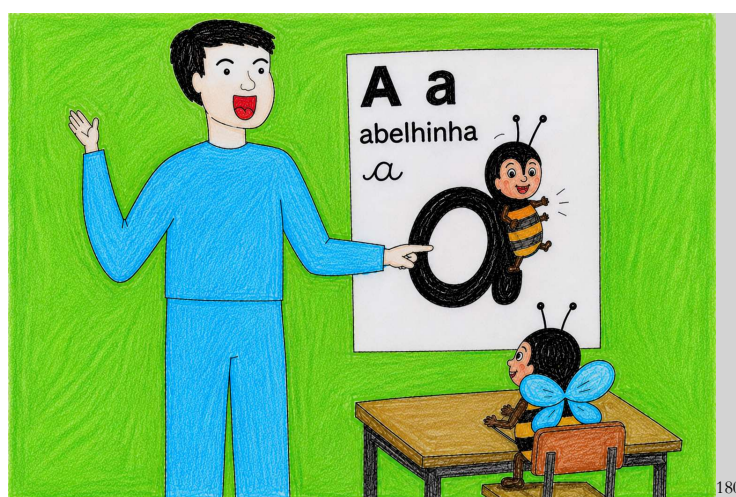
(79) 从属关系是一种分工合作的方式。它意味着为了管理而在一定程度上让渡自由意志，但这并不是失去，而是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汇聚力量。凡是需要从属的任务，都不应该包含强制或尊严的丧失。共同的意愿和积极的表达，才是真正高效的工具。

(80) 我们都是同一物种的人——无论年龄、肤色、社会阶层；无论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还是雇员与雇主、专业人士、学生或失业者；无论男女；我们都对自己的身体负责，都是会思考的存在。我们需要彼此联系，而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情感，是以友谊形式体现的爱——这对任何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81) 我们最大的力量，不只是意志力，更重要的是善意。

图像 IV

在下一部分“行动主义”中，展示的是作者在项目《从字母开始学习葡萄牙语阅读》中创作的图像：一只小蜜蜂心不在焉地飞着，结果以一种非常滑稽的方式掉了下来，引得大家大笑。随后，老师教授字母“A”，并给孩子们展示蜜蜂的歌：“啊，啊，啊，小蜜蜂飞；啊，啊，啊，小蜜蜂飞；只有一只翅膀，它看起来真滑稽；只有一只翅膀，它看起来真滑稽。”



180 音乐和图像来自“蜜蜂方法”（Método da Abelhinha）展板，由阿尔齐拉·桑帕约·巴西尔·达·席尔瓦、露西亚·马尔克斯·皮涅罗和里索莱塔·费雷拉·卡多佐创作。



“每一个教育体系，都是一种维持或改变话语适配性的方式，同时也涉及其中所蕴含的知识与权力。”

Michel Foucault



权力的谱系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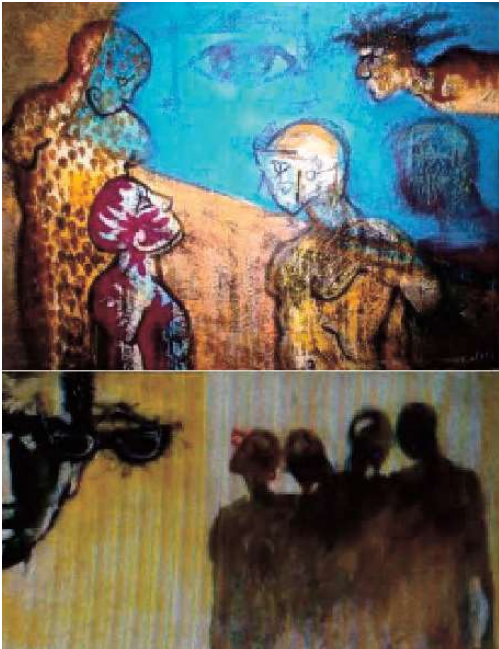
就像德国哲学家尼采一样，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也发展了他自己的“谱系学”方法。其出发点在于：诸如善与恶、真与假、对与错、健康与疾病等价值，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并与社会中的权力利益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什么被定义为“善”“真”或“健康”，取决于权力所处的位置。



心理学永远无法对“疯狂”说出真理，因为恰恰是“疯狂”掌握着心理学的真相。

Michel Foucault
France / Philo
1926 / 1984

www.citador.pt



福柯：权力无处不在

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权力分析领域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他不再把权力看作是某些主体用来实施强制的工具，也不局限于这些主体所运作的具体结构，而是提出：“权力无处不在”——它弥散在话语、知识以及所谓的“真理体制”之中（Foucault, 1991；Rabinow, 1991）。在福柯看来，权力塑造了“我们是谁”，它运作的层面与传统

来源：pt.slideshare.net 和 powercube.net 链接：<https://pt.slideshare.net/slideshow/sociologia-michel-foucault/37977712>(<https://pt.slideshare.net/slideshow/sociologia-michel-foucault/37977712>)
[www.powercube.net/other-forms-of-power/foucault-power-is-everywhere/]
(<http://www.powercube.net/other-forms-of-power/foucault-power-is-everywhere/>)